



OSID

张武龄家庭教育方法及其当代启示

朱梅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张武龄是民初教育名人,他秉持一种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家庭教育观。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他成功教育了自己的十个子女,并形成了立身立学、榜样示范,把控方向、顺其自然,民主平等、相互尊重,环境熏陶、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方法。张武龄的家庭教育方法为当前的家庭教育提供了以下启示:以身为教,提高素养;抓大放小,有效教育;亦师亦友,角色多样;创造环境,守护家风。

关键词:张武龄;家庭教育观;启示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3)01-0111-06

张武龄(1889—1938),字绳进,后取名为张冀牖、张吉友,原籍安徽合肥,清末淮军将领张树声之后,曾创办乐益女子中学与平林男子中学。张武龄共育有十个孩子,四女六男。四个女儿聪慧多才,是民国著名的“张氏四姐妹”,六个儿子也品学兼佳,各有建树。张家十个子女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张武龄开明的家庭教育观和多样的家庭教育方法奠定了子女成长的基础,从而使他们获得了追求幸福、谋求幸福的能力。

一、张武龄的家庭教育观及其子女成就

张武龄重视子女教育,虽然张家在合肥是显赫世家,财产丰厚,但他却希望子女能够远离奢靡享受的生活,迎接新风,成为独立自主,积极进取,具有知识文化,品行良好,身心健康的有用之人。这种希冀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孩子们的名字中,四个女儿的名字分别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六个儿子的名字分别为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女孩的名字均有两条修长的腿(“儿”),未带有一点“花草气”和“脂粉味”,暗指她们要主动接受教育,接触新思想,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走向世界。男孩的名字里均有一个“宀”,寓意他们要顶天立地,继承家声,成为有用之人^{[1]54}。另外,“和”字是张家第十四代人的辈分,意为“和以致福,善可钟祥”^{[1]54},这既承载着一个家族的愿景,也寄托着一名父亲对子女的要求,即将与人为善、以和为贵作为重要的人生守则和处世信

条。所以,张家的儿女,无论是走向外界,还是留在家中,都不能养尊处优,一无是处,须在道德、知识、体力等方面有所发展,成为“裨益社会”的人才。

遵循着这一观念,张武龄主动寻师择校,使他们在戏曲、文学、教育、音乐、科学研究等领域各有发展。长女张元和一生钟爱昆曲,常演义务戏;二女张允和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组长、主委,致力于昆曲的保护与复兴;三女张兆和是一名作家,代表作为《湖畔》,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四女张充和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演昆曲《牡丹亭》,在北大开设昆曲和书法课。移居美国后,张充和依旧活跃在各所大学以及学术场合,其中不乏耶鲁、哈佛等世界名校^{[2]333-345}。张武龄的六个儿子也各有建树。长子张宗和是历史学教授、业余曲家,先后任教西南联大、贵州大学;二子张寅和读完光华大学后赴日本留学,做过会计、教师;三子张定和是作曲家,曾入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歌剧舞剧院执教,2002年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奖;四子张宇和是植物学家,主要从事园艺和植物引种驯育教学与研究;五子张寰和曾任乐益女中,苏州第六、第八初级中学校长;六子张宁和是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后成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1]176-179}。

二、张武龄的家庭教育方法

张武龄教育观念开明,教育方法多样,他以立身立学、榜样示范,把控方向、顺其自然,民主平等、相

收稿日期:2022-11-11

作者简介:朱梅,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

互尊重,环境熏陶、耳濡目染的方法教育子女,而张家十子女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也印证了张武龄家庭教育方法的有效性。

(一)立身立学,榜样示范

1. 热爱学习

张武龄的“富”,主要富在学习精神上,他自发地阅读和学习,从不懈怠,堪称是“辛亥一代的自学人”^{[3]158}。在子女们的记忆中,张武龄每天最主要的活动就是阅读,内容涉及诗歌、散文、随笔、小说、传记、历史、儒经、戏曲、剧本、文学评论、翻译作品……几乎手不释卷^{[4]83}。除了书籍,他所看的报纸也种类多样、数量繁多,有《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晶报》《金刚钻报》等大小报,约有二三十种^{[5]33-34}。除了在家学习,张武龄还经常外出寻求知识。在创办学校之时,他主动拜访知名教育人士,如蔡元培、马相伯、吴研因、陶行知等人,吸收他们先进的教育理念。一旦遇到优秀的教师的讲座,他都会专程去听,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张寰和在上海读书时,他连续到校听胡朴安先生讲《荀子》;韦均一(张武龄第二任妻子)在无锡读书,他又跑去听唐文治先生的课;章太炎在苏州创办国学讲学堂,他不仅时常去听课,还主动与其讨论^{[6]16-18}。张武龄不断谘师访友,虚心学习,博采众长,这种追求进步的意识使得他的眼界和格局更为开阔,知识更加丰富。此外,张武龄还善于发展自己的爱好,他对昆曲、篆字、天文学、英语、法语也有所了解和研究。

2. 洁身自好

民国时期,很多文人染有不良嗜好,如梁启超、胡适、张恨水痴迷于麻将,鲁迅、闻一多、林语堂嗜烟如命等。在各种花边新闻大爆发的民国盛期,出身富贵的张武龄却洁身自好,坚守原则,他既不打麻将,也不沾烟酒。韦布(韦均一的弟弟)曾评价,张武龄不同于“五四”以来的一般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家庭,竟然一副牌都找不到。他从未有任何一种坏习惯,除了坐马桶的时间比较长,然而,他的注意力竟然还是集中在身前凳子的报纸上^{[5]32-33}。此外,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他摒弃封建旧俗,拒不纳妾,始终保持着一夫一妻的单纯婚姻关系。张武龄在生活中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积极倡导儿女、仆人们养成良好习惯。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所累积的财富被他更多地用来买书,兴办教育,与人为善,令人赞叹是位“奇人”。张武龄的“奇”给子女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时时刻刻都能接触到的模范。受其影响,张家十子女,除二子张寅和会抽烟,其余子女皆承袭张武龄,主动规避陋习,在混乱

的时代中始终保持个人的节操。

3. 宽以待人

张武龄性情温和、宽以待人。在学校,张武龄是一位极具包容心的校主。当时,一些乐益教师(共产党人)在敏感时期从事活动,引起当局注意,学校被指责“赤化”,还被多次威胁封校,张武龄虽无奈解聘了他们,却仍在暗地里赠送安家费、路费,如匡亚明。张武龄是大地主出身,但他并未回避这一事实,而是主动运用自己的财富为社会谋福利,办学就是其中一项。在他兴办的学校里,有一些学生利用作文大力批判地主,如唐月华的小说《贫与富》,她借佃户的口斥责地主甚至比强盗更可恨,后来这篇文章还被收录在由他捐资的校刊上^{[3]152-153}。在家里,张武龄是一位谦和、宽容的一家之主。他从不对下人摆架子,相处极为平常,尽管极其厌恶佣人们赌博,却也没有对他们痛打痛骂。张武龄处理的方式十分有趣,首先,意外现身;然后,趁其不备夺牌;最后,扔房顶或者河流,来个“消尸灭迹”^{[3]174}。有一次,因男工房赌钱误事,他痛下“杀手”,实际也只是用指头敲了脑门^{[3]177}。再如,针对家中保姆的过分节俭(有缺损的细瓷饭碗不舍得扔掉),张武龄也不批评说教,他用过饭后,默不作声地将空碗平举着,然后松手,就让其“英勇就义”了^{[6]15},这种平和、宽厚的作风也影响了子女的生活态度。

4. 克尽阙职

张武龄致力办学,克尽阙职。作为校主,他虚心向教育人士请教,延聘优秀教师,全力筹备学校办学资金,为此殚精竭虑,这是他对于工作事业的态度。这种在工作上专心致志、尽职尽责的使命感由张武龄传给“和”字一辈,接着又传给他们的后代,成为“张家人”的精神印记之一。例如,张允和在昆曲研习社工作时,兢兢业业,即使升任主委,也毫不懈怠。张兆和在《人民文学》担任编辑时,态度严谨,要求细致,就连丈夫沈从文都不敢轻易将自己的新作给她看^{[3]399}。张充和在战时曾负责国家礼乐的整理和编选工作,完成任务后,精益求精的她又将整理出来的二十四篇礼乐用毛笔书写呈交,更显珍重^{[3]454}。在张以韵的记忆中,父亲张寅和常常看书、备课到深夜,受其影响,他们兄妹四人对待工作也极为认真。张定和、张宁和两兄弟涉足音乐领域。张定和在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多年甘于寂寞、坚持创作的结果。张宁和的音乐成就也是勤奋苦练而得,有段时间,他住在张允和家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练琴,下巴处磨破了皮又结了痂^{[3]627},令人感叹成功来之不易。

(二) 把控方向, 顺其自然

1. 自由玩耍

张武龄给予孩子们自由发展的空间, 但绝不允许他们耽于享乐。他对于子女的态度为: 给予充分的选择权。张家十子女童年时期的活动主要围绕两大主题。主题之一: 戏曲。张武龄与陆英(第一任妻子)均为戏迷。在上海时, 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每次随母亲看戏回来, 都会在家中“复习”一遍, 模仿艺人的表演。她们总共演过四出戏, 《三娘教子》《探亲相骂》《小上坟》《小放牛》, 演戏准备得甚是周到, 各种各样的小道具为: 筷子(剪刀、棍子), 篮子, 小手帕(水袖), 纸头(胡子), 鸡毛掸子(马鞭), 姐妹们玩得不亦乐乎^{[7]80-81}。搬到苏州后, 张武龄请了专业的昆曲老师, 女孩们开始学曲, 男孩们也参与其中(或学曲, 或辅佐, 或观看), 几乎将“戏曲”从小“玩”到大。主题之二: 寿宁弄乐园。苏州的寿宁弄是孩子们尽情玩乐的一个城堡, 也是他们童年幸福生活的缩影。在“寿宁弄八号”的乐园里, 姐妹们时而斯文, 学习王羲之“临池洗砚”, 时而随心所欲地爬山、玩水^{[7]71}。园里种有杏树、枣树和柿子树, 兄弟们每次都会守着这些树结果子。晚年躺在病床上的张寅和, 仍忆起寿宁弄花园里的柳树、鱼池, 尤其对他们兄弟几个, 头顶脸盆, 冒着果雨, 相互竞争的场景念念不忘^{[1]182}。

2. 引导、支持学习、爱好

张武龄引导、支持孩子们的学习、爱好, 为他们提供各种优质资源, 但并不强求结果。他实行鼓励式家教, 有次闲谈, 张武龄问起女儿最喜欢的诗人, 张允和回答纳兰性德, 他随即拿来《饮水》《侧帽词》, 只评价了一句: 纳兰性德是难得的才子, 性情中人^{[4]99}。张宇和有段时间对篆书很感兴趣, 他写了一份“篆书”拿给父亲看, 张武龄先肯定了他的热情, 继而又教他篆书的写法, 虽然后来这门学习不了了之, 张武龄也不勉强, 一笑而过^{[1]189}。张寰和平日最爱琢磨相机, 见他对摄影感兴趣, 张武龄不仅将自己珍贵的名牌相机交给他, 还经常带他拜访名人, 邀他为自己以及其他家人拍照。张元和在学校有话剧或者舞蹈表演时, 他不吝拿出好绸缎料子, 随她设计或者找人订制。张家的子女除了擅长昆曲, 京剧也通一二, 这都得益于张武龄收藏的唱片。张寅和九岁就登上了青年会的舞台, 扮演《空城计》的孔明, 张宗和演司马懿, 张定和、张宇和演老兵, 堪称人才云集的“张家少年班”^{[5]11}。张武龄的引导与支持, 最终使得孩子们在戏曲、文学、书法、音乐、自然研究等领域各有所长。

3. 恋爱、婚姻自由

中国妇女的婚姻历来由家庭长辈做主, “五四”之后, 伦理革命势不可挡, 随着大学男女同校, 社会交往的公开, “自由恋爱”的兴起, 开始为社会接纳^[8]。作为较早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张武龄秉持恋爱、婚姻自由的观念。以张氏四姐妹的婚姻为例。张允和最先确定了终身大事, 周有光评价道, 在当时的背景下, 张武龄完全支持自由恋爱, 实在难能可贵。张兆和同意嫁给沈从文后, 他便准备提亲事宜, 即使一清二白的沈从文与出身名门的张兆和并不相配, 张武龄夫妇也欣然同意, 根本无须费力劝说。张元和的婚姻较为坎坷, 因为她爱上了一位昆曲伶人。昆曲虽然被尊崇为高雅的艺术, 但是演唱的戏子却是卑微、低贱的^{[3]240}。她的二妹、三妹陆续成婚, 自己也逾三十岁。张武龄没有催促女儿尽早结婚, 或另找个门当户对的男士共度一生, 他相信张元和经过思量后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张元和也相信, 以父亲开明的思想, 还有他的艺术鉴赏品味, 他不会反对这门婚事。然而, 当她终于下定决心寄信时, 张武龄去世了。张允和才华出众, 不乏追求者, 但她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 不急于求成, 降心相从, 这是张家自由风气的又一体现。

(三) 民主平等, 相互尊重

1. 注重沟通交流, 不滥用家长权威

张武龄教育子女时, 从不滥用家长权威, 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 采取合适的方法, 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比如, 当看到孩子们学大人模样, 掷骰子、玩骨牌、赶老羊时, 对赌博之事极为厌恶的张武龄没有当场斥责她们, 他将几个孩子叫入书房, 劝说道: “小姑娘们, 来学唱昆曲, 爸爸替你们做花衣服, 上台唱戏, 美不美?”^{[3]307}从此她们被“诱惑”进了书房学昆曲。张宇和读初中时, 成绩优异, 但他却因“书面侮辱老师”, 被校长汪懋祖“勒令退学”, 回到家中, 张武龄并非气势汹汹、不问是非地先责骂一通, 而是耐心询问, 得知他写信质疑老师的授课方式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老师的党义课枯燥乏味, 且有大段的空白时间), 弄清原委后, 张武龄轻松地说了一句“你没有错”^{[6]13-15}, 有效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然而, 张武龄并非放弃家长的“权威”, 如他教育张定和、张宇和两兄弟要注重公私分明, 勿要拿学校的东西随意使用。在这件“小事”上, 张武龄秉持“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态度, 他收起一贯的温和面容, 严肃、谨慎地处理, 使孩子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成功把错误扼杀在摇篮里。

2. 与子女交朋友

子女年幼时,张武龄陪着他们玩游戏,给他们讲故事。待子女渐长,张武龄就与他们谈书、论诗,时常将一些奇思妙想,同子女们分享。张宗和在日记中就展示了张武龄的这一面^[9]:

1930年11月12日:爸爸召集先生们同我们比赛打篮球……他一球也没有接到。

1930年12月14日:爸爸想造游泳池,改造脚踏车,两轮变三轮……早上还没起床,他又跑过来和我讲滑冰鞋的事。

1930年12月24日:爸爸看到我桌上的《两当轩》中的《绮怀诗》,给我讲了几个古典的掌故。

1931年3月1日:爸爸告诉我一首诗,其中有一联,“野店酒香春烂漫,琼楼云净月婵娟”。

1931年5月29日:爸爸预备把乐益变成一个博物馆……路上,他又与我讲诗。

1931年6月26日:爸爸特地送一件纺绸大褂子来给我毕业典礼出风头的,他真是好。

在张宗和的日记中,张武龄想象力丰富,温暖体贴,既是良师,也是益友。不止张宗和,几乎所有的子女都知道张武龄是个富有童心的人。例如,他听力弱(几乎不用电话),还让人拍摄假装听电话的照片。他看到女儿们排练昆曲,心痒难耐,想扮小丑,化好妆之后,又急忙反悔^{[3]178}……让人看到一位父亲的多面形象。

(四) 环境熏陶,耳濡目染

1. 居住环境:“张父二迁”

张武龄总共进行过两次大的迁移,第一次是从合肥老家迁往上海;第二次是从上海迁往苏州。张武龄决意“走出合肥”的原因很多,除了复杂的社会背景,还与家族内部存在的不良风气有关,以棋牌为乐的,吸食鸦片的,耽于享受,不问家事的^{[3]113}。对于向往民主自由,急于求新求变的张武龄而言,合肥不是久留之地。1911年之后,张武龄携全家迁居上海。这一时期的上海既有大都市的开放与现代化,又有各种不稳定因素。在这座城市里,从流浪汉、妓女到外交家、暴发户,应有尽有,它的包容性远比想象中宽广^[10]。此外,据张允和所说,在上海,他们的家被盗了两次,搬了三次^{[1]144}。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1917年,张武龄又带领家人迁到苏州。苏州具有许多优点,它相对安闲,生活节奏舒缓,距离上海较近,还是昆曲的发源地……张武龄和陆英最终找到了“寿宁弄8号”,这里有凉亭、假山、果树、花草,古朴自然、雅致素静^{[7]71}。孩子们不再被厚重的高墙阻隔,能够迈出家门,游览山水,欣赏美景。这两

次迁移整个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使他们渐渐与那个庞大家族里的种种繁文缛节脱离,他们的学习、爱好、择友等都因此发生了变化,教育环境的改变使其获得了全新的成长历程。

2. 心理环境:家庭和睦,创造爱的氛围

家庭和睦,尤其是家庭父母关系的和谐,能够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11]144}。张武龄与陆英感情融洽,夫妇俩的书房隔窗相望,两人虽甚少甜言蜜语,但陆英桌上一个刻着“只羡鸳鸯不羡仙”的铜镇纸^{[3]158},悄无声息地连接着两个人的心。苏州的这段日子是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光,对于张武龄来说,家中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有大把的时间用来读书;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近乎完美的父亲和母亲,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张兆和回忆道,父亲经常带着她们散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讲着有趣的故事,回程还会买些“零嘴”给她们解解馋。陆英去世后,张武龄又续娶了韦均一,由于两人的年龄、性格差距较大,这段婚姻并不尽如人意。对于韦均一在婚姻中表现出的不满,张武龄都给予隐忍和宽容,他尽可能多地抽出时间,陪她读书、听讲座、看戏、看美术展,并且支持她去上海学习国画^{[1]69}。在他的努力下,两人有了较多相同的兴趣和共同语言,尽管也有争吵和别扭,但张武龄在孩子们面前总是极力化解矛盾。张武龄在家庭生活中注重“以和为贵”,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张家的子女们也理解并学会了如何去爱人,怎样处理人际关系等一些重要的命题。

3. 文化环境:家风传承,书香不减

“公祖讳世科,太学生,考讳杰,皆有名德”^[12]。张荫谷、张树声、张华奎均勤于读书,到了张武龄这一代,张家浓厚的读书、学习之风依旧不减。他乐于买书,富于藏书,热爱学习。张元和曾回忆,父亲买书成痴,他一家一家地买,结果把入住宾馆的衣柜都装满了^{[5]10}。到苏州后,张武龄买书更无节制,当地有规模的两家书店一有新书,就立马整捆送到张家。张武龄家专设两个40平方米的房间用来藏书,包括善本和线装书、现代书籍,大量的文艺作品(宋词、元曲、唱本、戏剧论文)等,此外,大报、小报、流行或传奇的报刊均有,家中藏书之多,在苏州的许多缙绅里也能排上前列^{[5]33-34}。张武龄鼓励孩子们自由阅读,并以身作则,为他们营造了一个爱好读书、自由读书的环境。受深厚的家庭文化熏陶,张家姐弟自幼就喜爱读书学习。如张允和从小读《红楼梦》,对黛玉的《葬花词》以及十二首人物曲子早已烂熟于心^{[3]273}。张寅和热爱读书,学校图书馆甚至都难以满足,引得老师频频采购^{[1]181}。张兆和直到晚年依

旧读书、吟诗,修身养性,完善自我……对于张家姐弟而言,读书不仅是一件乐事,也是终其一生的事业。

三、张武龄家庭教育方法的当代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五条强调家庭教育应当“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13]。张武龄“一门十子皆是俊才”的成功家庭教育案例,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教子之道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了以下启示:以身为教,提高素养;抓大放小,有效教育;亦师亦友,角色多样;创造环境,守护家风。

(一) 以身为教,提高素养

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的言谈举止要尽显教育的作用,成为子女效法和模仿的榜样,而言传与身教相比,身教则具有更深重、更长久的影响力^{[11]161}。在张武龄的家庭教育方法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的“身教”。他的热爱学习、洁身自好、宽厚仁慈、克尽阙职等从不以“说”的形式进行,而是用无声的语言——行动传达给他们。张武龄的以身作则,榜样示范,使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给予了他们强大的发展力量。从张武龄身上,我们能够窥见张家子女优秀的出处。“以身为教”要求父母能够更新观念,不断学习,提高做父母的意识和素养,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威信、有理智的父母。当前父母在教育子女时的一个明显误区在于,他们将自己视为家庭中“不可置疑的权威”、并以“榜样者”自居,所以常常任意地、不加思索地就开始行使这项权利,以不可违抗的命令形式进行。然而,做合格的父母需要学习,做优秀的父母更需要学习。现代家庭的父母需要保持一种认识,即将为人父母这一角色始终当作一项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工程进行,与子女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二) 抓大放小,有效教育

抓大放小,是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父母不仅是教育者,同样也是一名管理者,将这一概念引入家庭教育领域,意在呼吁家长要敢于“放小”,以促进家庭教育管理质量的提高,实现有效教育。在家庭教育中,“抓大放小”的“抓大”主要是涉及原则性的问题,包括对孩子思想道德、行为习惯等的管理和控制。家长在处理这类事件时,需“紧抓”“严管”,绝不容忍和退让。“放小”指对一些次要的事情敢于放手。“放”不是不管,不是放弃家长处理这类事物的权利和责任,而是主要表现在孩子选择上的较多自主性。“抓大放小”在家庭教育中的本质为,既最大限度地给予孩子自由发展空间,又能在关键点上提纲振领。在当代家庭中,有“抓大抓小”型

父母,大小事务皆一手掌管,不留选择的余地;有“抓小放大”型父母,只盯紧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关注他们的心理发展,以致因“小”失“大”;还有“甩手掌柜”型父母,将孩子的一切都交予学校或者他人处理。张武龄则是典型的“抓大放小”型父母,他只把握关键性的方向,并不破坏他们的自由空间,插手他们的自主选择,以一种“尚自然”“展个性”的方式促进孩子们成长。总之,父母应注重抓大放小,让孩子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

(三) 亦师亦友,角色多样

现代父母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全方位的。从横向上来看,家长需要为未成年子女提供必要的生理资源、社会资源、物质保障,承担起对未成年子女的看护、保养、教育等责任,扮演“生活照顾者”“管教者”和“引领者”的角色^{[14]68-69}。从纵向上看,家长是指导孩子穿衣、吃饭、走路等行为的生活老师,是同他们一起参与游戏活动、分享玩具的伙伴;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是他们学习、做事的老师,是他们的“知心朋友”。尤其是在身心变化最大的青少年时期,家长要善于捕捉他们的性格特征,亦师亦友,做好教育指导工作,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三观。孩子们尚幼时,张武龄时常同他们做游戏、闲聊,充当玩伴。待孩子们渐长,张武龄就同他们交朋友,一起谈书、论诗,分享“奇思妙想”。他从不局限于单一角色,而是适时而变,在父亲、友人等角色中协调,虽然角色多样,但贯穿始终的是浓厚的爱意。基于张武龄的教子之道,当代的家长们需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责任,根据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灵活处理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应对,做到“在位、有为,既不失位,也不越位”^{[14]68}。

(四) 创造环境,厚植家风

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5]。“家风”是指家庭、家族延续下来的风气、作风,如梁氏家族的梁启超和他的五子四女,再如冯氏家族的冯友兰兄妹,他们在家族的积淀下取得非凡的成就,又以自身的精神激励数代人成长,成为家族发展的力量^{[1]6}。家庭环境是“家风”生存的土壤。首先,父母需要为孩子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帮助子女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其次,父母要为子女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如良好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让孩子时刻感受到“爱”的存在,并学会爱人。最后,父母还需要为孩子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孩子的模仿力极强,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他们的爱好、追求等都会对其产生影

响。张武龄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张家十子女也爱好读书、学习不止;张武龄钟情文艺,张家十子女也能登台唱曲、作诗作曲,艺术气息浓厚。一个家族或家庭家风的养成,根植于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因此当代家长要善于为孩子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使其能够在一种名为“家风”的“生态环境”中受到全面、深刻且无意识的教育。

参考文献:

- [1] 陈泓. 春梦水流痕:合肥张氏家族文化评传[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
- [2] 王道. 一生充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3] 王道. 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 [4] 金安平. 合肥四姊妹[M]. 凌云岚,杨早,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5] 张允和,张兆和. 浪花集[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 [6] 张允和,张兆和. 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M]. 合肥:安徽

文艺出版社,2009.

- [7] 叶稚珊. 张家旧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8] 杨联芬. “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2014(1):158-180,208.
- [9] 张宗和. 张宗和日记(1930—1936):第一卷[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 [10] 卢汉超.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 段炼,吴敏,子羽,译.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 [11] 李天燕. 家庭教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12] 顾廷龙,戴逸. 李鸿章全集[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EB/OL]. (2021-10-23)[2022-12-08].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0/8d266f0320b74e17b02cd43722eeb413.shtml>.
- [14] 潘士君. 当代家庭教育[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6.
- [15] 尹胜男. 习近平家风思想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责任编辑 石悦]

(上接第63页)

《杜诗详注》评曰:“郊居俗远,而又春水接连,写得野趣悠然。”^{[12]2281}《重过俱平声何氏五首》其四中的“颇怪朝参懒,应耽野趣长”,“野趣”反映的是闲适的心境。杜诗中不仅有“野趣”之趣,还有“野哭”之悲,如“野哭初闻战,樵歌稍出村”(《刈稻了咏怀》),“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阁夜》),“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晓发公安》)等。“野哭”之声是悲壮、凄惨的,杜甫诗作中的“野哭”反映的是战争的无情,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控诉。

四、结语

杜甫在诗歌创作中使用大量“野”字,以“在野”的心态去发现“野景”,抒发“野趣”,或突出“朝”与“野”的对立,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从而构建起杜诗中独特的“野”范畴。杜诗之“野”,不仅体现在用字、内容和风格上,还体现了杜甫的人格和志向。“少陵野老”,是杜甫对自我身份的定位;“野境”“野望”,体现了杜甫对质朴雄浑诗学境界的追求;“野兴”“野趣”体现出杜甫独具特色的审美情趣。因此,从“野”这一范畴去观照杜甫的自身形象和诗学境界,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角度,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许慎. 说文解字[M]. 王平,李建廷,编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 [2] 尚书[M]. 曾运乾,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3] 杨天宇. 周礼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4]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5] 葛兆光. 唐诗选注[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203.
- [6]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58:3312.
- [7] 司空图. 诗品集解[M]. 郭绍虞,集解.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8]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9] 郭绍虞. 宋诗话辑佚[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0] 韩成武. 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J]. 杜甫研究学刊,2009(2):27-34,47.
- [11] 刘长东. 论杜甫的隐逸思想[J]. 杜甫研究学刊,1994(3):19-24,8.
- [12] 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3] 孙昌武. 杜甫与佛教[J]. 东方论坛,2005(4):42-46,119.
- [14] 王嗣奭. 杜臆[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5]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16] 林继中. 杜诗《洗兵马》钱注发微[J]. 中华文史论丛,2011(3):335-368,396.

[责任编辑 于湘]